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曹文柱 著



商務印書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曹文柱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曹文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5612-0

I. 魏... II. 曹... III. 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9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ĒIJìn NÁNBĚICHÁO SHǏLùn HÉJí

魏 晋 南 北 朝 史 论 合 集

曹文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5612-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28.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主 任：郑师渠 晁福林

副主任：杨共乐 李 帆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东平 宁 欣 汝企和

李梅田 张 皓 张建华 侯树栋 耿向东

郭家宏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驹等，又有一批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	1
魏晋南北朝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	33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71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与文化的互动·····	85
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	104
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及其对前期社会的影响·····	121
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	146
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	163
东晋南朝官俸制度概说·····	178
东晋南朝时期国家户籍名籍中的各类人口·····	195
魏末晋初的陂塘之害·····	289
陈寿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说·····	295
皇甫谧研究·····	303
东晋陈郡谢氏三题·····	324
论政治生活中的王羲之·····	340
《宋书·蔡兴宗传》以女妻姊之孙辨析·····	353
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	359
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369
后记·····	442

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

社会风气,是某一区域人们在各类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属于社会心理状态和群体意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或称释放形式。它是风俗中的一种。研究历史上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迁,将有助于疏通社会史与各种类别史之间的联系渠道,有助于描绘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到怯懦、尚礼的变化过程。本文在勾勒这一变化轨迹的同时,试图对隐藏在社会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是采取谭其骧先生的划界标准,即指六朝时期建邺(建康)周围的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吴中七郡地区。^①它大致包括以今太湖为中心,北临长江,东绝大海,西至皖南宣城,南及浙江宁绍金衢的长江下游一带。3—6世纪,这里先后成为孙吴、东晋、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六个割据王朝统治的腹心区域。

一、六朝社会风气变迁的轨迹

西晋统一后,江南叛乱屡起,晋武帝深为所扰,《晋书》卷五二

^①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

《华谭传》保存有他与臣下的一段策问：

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赵眚，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他，非为蜀人敦惠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尽管晋武帝与华谭对吴地动乱起因的看法不甚相同，但是他们都承认“吴人赵眚”、“轻锐，难安易动”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为安定江南社会秩序，晋武帝恩威并施，一方面模仿前朝徙豪杰的办法，将“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①，又在颁布全国“州郡悉去兵”命令的同时，接受陶璜的建议，对江南各地的州兵不予约损；另一方面，也象征性地安置了一小部分江南大族子弟到北方为官。但是，这些措施效果并不突出，江南地区仍是“窃发为乱者相继”^②。

江南社会风气轻悍好斗，由来已久。春秋时期，吴中七郡大致分属于“同气共俗”^③却又交兵不已的吴越两国。“吴之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④。其中，越人“水行而山处，

①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② 《晋书》卷二八，《五行志》。

③ 《越绝书·范伯》。

④ 《吕氏春秋·知化》。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①。吴人则以“王刚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将明于法”^②，名震中原。他们崇尚好勇斗狠，鄙视恻隐忘仇，以所谓“不灭沥血之仇，不绝怀毒之怨，犹纵毛炉炭之上”^③为做人信条。

由于尚武，吴越两国都特别重视利器的制造。吴戈越剑以其工艺精良而称誉天下。《庄子·刻意》：“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吴剑之利，“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戮盘匱”^④。“操吴戈兮被犀甲”^⑤更成为对赳赳武夫最美好的赞词。近年来在各地陆续发现有吴越记铭的兵器，使文献记载得到大量的实物见证。

战国时期，吴越之地尽为楚有。秦汉一统，中央政府先后在这里设置过以会稽、吴为名目的郡治，其后统归扬州管辖。时光荏苒，五六百年，江南地区虽然历尽沧桑，社会风气却依然如旧，没有大的变化。《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概括各地风俗时，评述吴地说：“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初，刘邦“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镇之，诸子少，乃立（刘）濞”。不想，刘濞由此坐大，凭借吴地兵威竟自立为东帝。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名将周亚夫亲自领教了吴人的强悍，被迫同意“吴兵锐甚，难与争锋”^⑥的说法。直到东汉末年仍是“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⑦。

① 《越绝书·记地传》。

②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③ 《吴越春秋·公践入臣外传》。

④ 《战国策·赵策三》。

⑤ 《九歌·国殇》。

⑥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刘濞传》。

⑦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核传》。

除吴兵善战外,江南还多慷慨悲歌、伏节死难之士。《后汉书》所载的一些吴籍传主,如戴就、陆绩等人虽蒙冤入狱,却“掠考五毒,股肉消烂,终无异词”,被北人目为视死如归的豪侠之士。甚至连吴地女子也颇不示弱,吴郡吕荣得知官府将其杀父之仇捕获,遂“诣州,请甘心仇人”,然后亲自“手断其头,以祭升灵”^①。《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也对孙吴风俗表示了同晋武帝相同的看法:“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可见左思在《吴都赋》里讲的“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并非尽是文学家的夸张之词。

江南社会风气的变化,大约始于东晋后期。孙恩、卢循叛乱,“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被晋军主帅刘裕拒绝:“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②进入南朝,“南人怯懦,岂办作贼”^③已成官场定论。

到齐梁之时,江南社会风气与往昔大相径庭。“任气好武”非但不被世人推崇,反而到处受到轻视和耻笑。社会上下,弥漫着文弱怯懦之风。《颜氏家训·涉务》云: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

①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

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

③ 《宋书》卷八一,《顾恺之传》。

至此。

不仅社会上层柔靡脆弱,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再是“轻死易发”了。梁武帝天监九年,来自外部的兵患袭掠吴兴,所过势若席卷,未遇任何反抗。史家认为这是由于“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恒扰奔散”^①所致。《隋书》卷三一《地理志》在极力称颂吴中七郡物产的同时,对这里的社会风气评价也很高:“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与先秦、两汉、孙吴时期比较,社会风气判若天渊,迥然如两地。

二、江南早期社会风气形成原因的推测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地理环境、生产条件、政治演变和文化背景的规定和影响。从横向来说,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是多因的、多层次的;从纵向来说,它又是一个文化凝聚物不断沉淀、积累、变化、解体的历史过程。我们对江南早期社会风气的成因及其变迁原因所进行的探讨,仍是以上述认识为出发点的。

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发现,证实我们的祖先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只是以后这个发展停滞下来,逐渐被北方远远地抛在后面。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因素不可忽视。

^① 《梁书》卷二一,《蔡搏传》。

上古时期,江南地区虽然物产丰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①,但是由于气候过分炎热潮湿,不如黄河流域宜于居住,特别是这里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覆盖,榛莽丛生,沼泽四布,虫蛇虎豹,瘟疫呕泄,处处威胁着人类生存。尽管个别地区已有了农业,然而由于土质紧密,种植品种又主要是花费劳动力多、生产技术要求高的水稻,在原始生产工具和技术条件下,很难实现大量开垦。这就造成江南地区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必然要长期陷于十分原始的状态。司马迁、班固对此有过详尽描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讲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沓廛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进一步补充说,江南“以鱼猎山伐为业”^②。

“火耕水耨”、“鱼猎山伐”的生产方式,不能为社会提供多少物质财富。“无积聚而多贫”以及“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社会生活,表明吴越两地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财产的分化并不剧烈。这势必为氏族制度某些残余的保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恩格斯曾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他还讲,“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就是由血族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们之间“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③。根据《左传》、《史记》和《国语》等文献的记载,春秋时期江南地区多次的对内对外战争都掺杂有血族复仇的特征。《吕氏春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秋·察微》叙述的吴楚鸡父之战甚为典型：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齿，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

在含有血族复仇观念的战争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把勇敢杀敌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乎？”^①在他们看来，弃仇不杀是愚蠢的表现，也是一种丑恶的犯罪行为。越灭吴后，越大夫文种罗列吴王夫差六大罪状，其一曰：“昔越亲戕吴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从天命，而弃其仇，后为大患”^②。文种身为越臣，竟视夫差不杀越王勾践为大过，正是血族复仇观念的反映。

除血族复仇观念外，氏族遗存还使这里的人们把发动掠夺战争作为扩充财富的正当手段。中原地区的文明和富足同江南物质财富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引起江南地区上层人物的惊羨。《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载其观鲁国礼乐后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当然，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对方的财产方面。“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

① 《国语·越语下》。

②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①吴越对外战争的重点在北方。不管哪一方在击败对手之后,都要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中原。如果说北方列强的争霸还要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为维持各国间的均衡尽一点义务的话,那么江南的霸主感兴趣的只是对被征服国的物质掠夺了。《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吴征百牢,竟要一个国弱民寡的邾国承纳军赋六百乘的超额负担。吴亡后,越国步其后尘,为更有效地控制中原的中小国家,榨取更多的贡赋,甚至一度把都城迁到了山东的琅琊。

原始的图腾崇拜、迷信鬼魅,养成了吴越人喜欢自残和对武力的盲从观念。吴越两国都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左传》哀公七年载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论衡·四讳》也说:“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断发就是剪发,冒首代冠。文身则在身上黥作龙蛇纹样,“刻其肌,以丹青涅之”^②。吴越断发文身起源于对龙蛇的图腾崇拜。《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集解引应劭注曰:“(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落后民族“在自己身体刻画上图腾的形态”,“强调他们与图腾间的相似性”^③。他们想以此避免受到图腾伤害,并希望能够借助到图腾身上的神奇力量。随着时间的久远,断发文身在图腾崇拜之外又有了新的意义。《淮南子·泰龙训》:“刻肌肤,镌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②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 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台湾志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35页。

为之，以求荣也。”高诱注曰：“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实际上这已成为原始尚武精神在自身肉体上的炫耀和宣泄。而迷信鬼魅，又使吴越人的言行增加了愚昧性和盲从性。魅也是鬼，《集韵》释之曰：“南方之鬼曰魅”，“吴人曰鬼，越人曰魅”。《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云：“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人鬼之间靠鸡卜或甲卜进行沟通，“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①。吴越人祠祭鬼神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得到鬼神的暗示，以获取战争的胜利，反映了他们的鬼神迷信思想与尚武精神之间的相交相汇、密不可分。

在文明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春秋时期，江南地区氏族旧制、图腾鬼神意识所赋予民众的好战尚武观念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它进可使其实现争霸的野心，退可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得以自保。统治者希望把这一观念固定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以约束、控制、克服与它相抵触的各种个人欲求。在社会风气形成的过程中，统治阶层有意识的提倡和引导的作用相当突出，古人在解释风俗的涵义时都敏感地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班固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释风俗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之情欲，故谓之俗。”元人李果更直接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②吴国统治者鼓吹：“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③而父母、兄弟、朋友之仇又是同“臣而思报君之仇”联

① 《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

② 《风俗通义》，卷首题辞。

③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系在一起的。吴人还强调军队应该“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①。《墨子·节葬》也讲，越王北上争霸，“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天下。”《韩非子·内储说》叙述了如下的典故：“越王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公见怒蛙，乃为之式。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真有气故也。’明年，有请以头献王者十余人。”“越王问于文种大夫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厚赏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这些例证，都可视为统治者对尚武精神有意识地树立和引导。班固对江南尚武民风形成的因果关系理解得更为直接：“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②此论是颇有见地的。

于是，狂热的血族复仇意识、野蛮的抢掠习惯和自残嗜杀的原始宗教迷信观念，经过统治者的提倡，逐渐熔铸成全社会必须普遍承认的崇尚武力的行为规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又把这种外在的规范，移入内在的心理之中，日渐凝聚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意志结构。秦汉以来，政治上的大背景虽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几百年来积累、凝聚下来的心理素质不会马上随之变化。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稳定性，甚至是滞后性。特别是江南地区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经济、文化相对处于缓慢发展状态，整个地区的小气候变化不大。好战尚武精神如同存在于社会风气中的

① 《史记》卷六五，《孙子列传》。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